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叶显恩/著

徽州与粤海 论稿



HUIZHOU YU YUEHAI LUNGAO

安徽大学出版社

咸豐玖年

● 叶显恩/著

徽州与粤海 论稿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徽州与粤海论稿 / 叶显恩 著. —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12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ISBN 7-81052-953-6

I. 徽... II. 叶... III. ①徽州地区—地方史—研究
②珠江三角洲—地方史—研究

IV. K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7799 号

徽州与粤海论稿

叶显恩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7145	开 本	850 × 1168 1/32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张	14.25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字 数	342 千
责任编辑	张朝胜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953-6/K·71

定价 22.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叶显恩，1937年生，海南省临高县人。1962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5年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4年转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组建经济史研究室，任室主任、研究员，兼任明史学会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中国经济史研究会会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曾受聘为美国Luce基金会访问学者、美国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大阪大学客座教授、瑞典隆德大学客座教授等。著作有《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等多种专著与多篇论文。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

出版说明

1999年12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被列入国家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心确立的发展战略:第一步是搜集和整理徽州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徽学作为新兴学科的发展打下坚实的资料基础;第二步的工作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徽学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系统的研究,写出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目前,第一步的工作已经有效展开,《徽州文献综录》、《徽州文化遗存的调查与研究》和《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整理》等重大项目陆续完成并出版了部分成果。第二步的工作也已经开展,出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就是具体举措之一。

本丛书坚持学术质量至上的原则。不限种数,凡是以徽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集均可列入。按照程序,先由作者提供书稿,中心邀请专家评审,达到出版的学术水平,即可列入丛书予以出版,出版经费由中心筹集。这是解决学术著作出版困难、特别是推动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学术丛书》这一命名,是根据国家教育部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要求决定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明确要求,重点研究基地的人员是流动的,实行“带课题进所,完成课题离所”的动态机制。因此,丛书作者的人事关系不一定在中心,但只

要被中心聘任为专、兼职研究人员,其研究著作均可列入本丛书。

学术乃天下公器。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依托于安徽大学,在学术上却面向国内外学术界。中心愿意为从事徽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成果出版的途径;同时,也通过这一途径有力地推动徽学的学术事业,希望得到学术界和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二〇〇四年九月

目 录

拓荒者的步伐和学术的里程碑	韦庆远	1
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自序)		9

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

——《徽州文化全书》总序		26
徽州和珠江三角洲宗法制比较研究		51
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		71
明中叶中国海上贸易与徽州海商		100
明清时期徽州的刻书和版画		131
关于徽州的佃仆制		148

徽州学在海外		175
--------------	--	-----

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共推徽学研究

——序姚邦藻主编《徽州学概论》		180
-----------------------	--	-----

学术使命感与全情投入

——序王振忠著《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		188
--------------------------	--	-----

科学技术影响的隽永魅力

——序汪明裕主编《千年徽州杰出历史人物》		193
----------------------------	--	-----

徽商与徽州的文化底蕴

——序汪明裕主编《古代商人》…………… 198

史学的探幽索微与投入现实情怀

——序叶鸣声、刘伯山主编《徽州文化研究》…………… 204

移民与珠江三角洲海洋经济化…………… 207

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 253

16 世纪广州市场结构、功能

与运作方式的历史性变化…………… 279

世界商业扩张时代的广州贸易:1750s ~ 1840s …… 295

粤商与广东航运业近代化:1842 ~ 1911 …… 316

晚明珠江三角洲区域社会情态的忠实记录

——《盟水斋存牍》简介…………… 343

清初李士桢抚粤政略与广东社会经济复苏…………… 350

明清珠江三角洲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372

地权、法权与家族主义…………… 397

中山县移民夏威夷的历史考察…………… 408

19 世纪下半叶夏威夷华人首富陈芳…………… 429

后 记…………… 446

拓荒者的步伐和学术的里程碑

韦庆远

—

披读了叶显恩先生的新著,笔者脑子里蓦然涌上一片亲切的回忆:时在1965年下半年,显恩随其师梁方仲教授来京作学术访问,我们有机会见面。他欣然告诉我,将以徽州的佃仆制度作为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题目,并即将前往安徽省的芜湖、合肥以及徽州的屯溪、歙县、祁门、休宁、黟县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搜集资料。当时的显恩,正处在风华正茂、头角峥嵘的青年时期,谈论到他即将要进行的学术实践活动,充满着向往和热切的追求,表现出一个青年学子旺盛的求知愿望。其后,他果然只身前往徽州进行调查研究。我从梁方仲教授处,不断听到他的行踪和可喜的收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显恩前往徽州进行考察时,中国大地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矛头直指吴晗先生的黑橄文已经发表,并在社会上引起了阵阵的喧哗。政治气候阴霾密布,乌云四合,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概。面对这种高压的政治气候,学术界都感到战栗和无奈。显恩作为一个青年学子,能够顶住压力,依然冷静地坚持学术活动,在当时是不多见的。他在安徽各地深入进行调研,访问各方面有关人士;在图书馆、档案馆搜集有关的文献资料,尤其是散落在民间的契约文书、

账簿、函札、碑文等。尤其在徽州，他深入实地考察，博访周咨。从穷乡僻壤到市镇墟集，从世家大户的厅堂到农家的茅舍，乃至祠堂、古庙、牌坊，都留下他的影踪；从晚清的科举前辈、官绅到徽商家族的后裔，从擅长当地掌故的父老到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佃仆子孙，他都作访谈笔录，穷搜口碑传说资料，以助见闻，以尽可能地追踪几百年以来徽州经济独具特色的发展历程。他尽可能将实地调查与文献记载逐一对比，务求信而有征、言而有据。显恩就是这样在当时沉闷得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下，执着地毅然前行，终于完成了他预定的学术考察任务，并为尔后徽学一系列的研究奠下基础。时隔近40年，显恩在京启行前奋发坚定的神色，在笔者脑中依然鲜明如昨，一直对自己起着砥砺共勉的作用，成为我们多年来学术友谊中的瑰宝珍藏。

我们知道，建国以来的经济史研究，一直着重于从宏观角度对生产关系、阶级矛盾及其斗争的研究，而较少能从微观角度，对一地区、一商帮、一人物、一事件进行认真和细致的考察。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还是一片抛荒的土地，即使个别学者有志于此，也由于种种原因而窒碍难行。显恩早在60年代中期，就已着手这方面的实践。他筚路蓝缕，锲而不舍，实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自70年代末拨乱反正以来，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调查报告、论文，出版了引起国内外普遍注目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一书；此书成为徽学研究的里程碑。又从80年代中期起，将相当的时间、精力扩展到珠江三角洲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曾多次单独或与海外学者合作进行选点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出版了《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史研究》等重要著作。先对这两个不同典型的重点地区，分别进行个案的深入探讨，再继以比较其同异，分析其短长，并放眼于当前商品大潮中因其所处的不同区位而显示出不同前景进行研究，以达到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目

的。应该说,显恩在徽州和珠三角两方面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都是有建树的,是与海内外对中国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发展同步前进,而且起到中坚的作用。徽州和珠三角两个地区是他个人近40年学术生涯中重要的学术家园。

二

比较研究是历史科学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同其所同,异其所异,才能更有力地显现出某一区域社会经济不同于其他区域发展的特点。不抓住特点,不从其特别处切入,仅是停留在泛泛而论,只能够写出平庸之作,缺乏学术品位。当然,所谓认真抓住特点,绝不是允许人为地营造特点,并肆意渲染夸大;必须是严肃地尊重客观历史真实,尽可能占有资料,并认真地对之进行鉴定核实,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估。唯有如此,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笔者认为,显恩在选题上以徽州和珠江三角洲为重点,着力研究,应该说是独具慧眼,而且是明智的,因为这两个区域都具有突出的特点,是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富矿”区。当然,正因其为“富矿”区,对之勘探、开采和鉴定、加工,就必须付出超乎寻常十倍的精力,必须具有吃大苦,耐大劳,甘寂寞,肯坐冷板凳的精神;必须具有经受得起挫折和失误的承受力,并且不断地矫正方向和完善方法,才能将研究工作进行到底。笔者有幸披读过他的主要著作,认为他是沿着这样的途径坚定前行的。即将出版的《徽州与粤海论稿》一书,就是他近年对这两处地区研究成果的结集。

三

徽州和珠江三角洲,一在中华腹地,一在南疆海滨,但它们却

在一些方面,有着相近似的背景,特别是在商业经济发展上,都曾享有过各具特色的辉煌。

它们都是以移民为主干构成的社会。徽州早在5~6世纪之间,自东晋和宋、齐、梁、陈时期,便有大批中原人士流寓江南,移入徽州;而直到12世纪初北宋末年,才有北方士民几经辗转相继南迁到珠江三角洲。这些先后由北到南的移民,都带来了中原发达的封建文化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到达定居地之后,都大力因适和充分利用当地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以谋求生存和发展,都能够反客为主,发展成为本地区人户的主体,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在徽州,由于土瘠田狭,农业生产不足以供养人口,几乎没有发展农业的空间,人们不得不为衣食而游散于四方,大量从事商业。由于经营范围日广,积累的资本和经验日多,终于在明代中期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的商帮之一,开创出“无徽不成镇”的鼎盛局面,并持续至晚清道光时期,历时近300年之久。在珠江三角洲,外来移民与土著居民结合,充分注意到位处海滨的特点,一方面自宋元以来便兴修堤围,束水攻沙,从海洋中拓广耕地;另一方面,大力开展海商贸易,内外贸并举,促使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日渐趋向繁荣,是由农业商品化和发展对外贸易共同推动的。

不论移入徽州或珠江三角洲的中原士民,都具有耐劳苦,勇开拓,善经营和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力求发展的共同特点。明中叶以来,徽商和以珠三角为主的粤商,都分别创造出辉煌的业绩,留下其不可磨灭的碑记。

综观显恩对徽州和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很明显地表现出他极力要对两个区域经济在地理条件的悬殊、经营行业的差异、对封建政权和通海贸易的依赖程度不同,及由此决定了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和转型等等,做出合理的说明。

在本书中,作者对两地宗族制做了比较研究,指出徽州宗族制是一直保持与正统文化相一致,堪称正统宗法制传承的典型,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制却是已经变异了的亚种形态。宗族制在徽州是以维护和谋求社会地位、政治特权为其主要功能;在珠江三角洲却着力于扩大其经济功能的一面。珠江三角洲的宗族直接经营产业,并出现向经济实体转变的趋向,宗族内部也相应出现利益分沾,而不是徽州的余缺互济的道义经济。徽州宗族制坚持“官本位”的价值观,商业经济只作为传统社会经济的附丽,而不是其异化的力量,因此徽州商业资本自不能超越传统社会所规范的商业运作的轨迹;但是,珠江三角洲人经商致富,却通过发挥货币经济的力量直接谋求与士绅并列的社会名流地位。因此,珠三角的宗族组织在农业商业化、商业企业化、乡村工业近代化中,直接充当或起支持者、组织者的作用。

16世纪,在世界出现海洋热、黄金热、香料热之后,肇始全球一体化之后,徽商与珠三角商人先后在海洋贸易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作者站在16世纪世界海洋贸易的高度,审视了以汪直为代表的徽州海上武装走私集团的商业行为及其性质。指出汪直等徽州海商集团亦商亦盗的行为,与西方各国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海域的行径,是大体雷同的,但彼此遭遇却迥然有别。西方的公司有本国政府作后盾,得到政府政治、经济、技术的支持,享有特许状、军事、殖民地等特权。而以汪直为代表的明中叶徽州海商,却被明朝政府诬之为寇而加以镇压。对历史上的所谓“倭寇”作了辨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论及粤商与广东航运业的近代化的关系时,作者通过对珠三角买办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在航运业活动的考察,提出了一些“悖论”。指出:珠江三角洲地处海洋交通前沿,受西方文化、经济与炮舰的冲击最早、最烈,对西方的认识与惊觉也

最深。面对鸦片战争后,广州作为对外贸易中心的丧失,不平等条约宣告行商制度的消亡,广州商人没有如同闽商般无所作为,而是因应形势的变化,随同西商迁移上海,作战略转移,先从之学再与之战。从40年代至80年代的40年间,珠江三角洲人充当了买办的主角。他们利用其买办的特殊身份,为兴办近代化实业积累了巨量的资本。他们在其家乡避实就虚,利用机会成本、人力资源等优势,在西商难以涉足的中小河涌,以小轮船推进了航运的近代化。他们中的代表者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在被迫开放的上海等口岸致力于航运近代化,与西商进行商战。尽管受到人们的诟病,但他们在兴办实业,推进近代化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者既把唐廷枢等人的行为,置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作实证分析,又用今天的价值观评判其当时的效果,及其对后人以至今人的潜在效应。

作者在本书的系列文章中明确指出,研究徽州和珠三角的差异,不能仅从经济层面中找原因,它是与两个区域移入定居者对宗法制、儒家教义和商帮贾人的发展方向大相径庭,密切相关联着的。“徽州的宗族制,坚持以父系为中心的严格的血缘关系,并与地缘相结合,坚持严格的尊卑长幼的等级制度和主仆名分;重坟墓祠堂”,“根据理学的伦理纲常制定宗规宗法”,不搞联宗通谱。总而言之,就是要严格保持与正统封建社会经济构架和礼仪文化一致。徽商致富之后,便极力培养子弟读书入仕,尽可能要跻上封建统治阶层。在市为商,在朝为官,在乡为绅,“贾服入儒”,以保证本人和宗族的商业利益。故此,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也多与朝廷和官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受其庇护,享受授给的独占性专利权,承接含有巨利的“钦派”或“官派”采购任务。诸如,明清食盐的产运销都是由政府垄断和招商经营的,盐商向为商户中的首富,又成为穷奢极侈的样板,朝廷和官府敲诈勒索的重要对象,而徽商正是

长期独霸淮扬盐业,居于盐商的领袖地位;明末及清代中期,宫廷屡次修建宫殿庙宇陵墓,需要购用大量优质木材,徽商又多取得经营“皇木”的特权,并且大量夹带私木,以牟取暴利;典当业兼营高利贷,不但关系社会民生,而且是负责钱银互兑,是各级官府周转金融财富的储水池,被称为“官家外库”,东南大典商以及专业性的从业人员——“朝奉”,绝大多数都是由徽商充任的。至于贩茶囤粮,也离不开“官商互济”。本书精辟之处,是以丰富的资料,说明徽商经营之道和致富之源,基本上是在传统封建体制中进行运转和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是浸透尊卑主仆的家族伦理及其制约下的‘官本位’价值观”。又更锐利地指出,徽商这样的价值观,“在引发营商致富动机中,已包含了否定或摧毁商业企业发展的因素”。随着封建经济政治体制内部的调整、政策的改变,而使得徽商的经营日渐萎缩,例如取消了分区专卖食盐的制度,徽籍盐商大多破产;又由于官方财政的窘困,特别是近代商业贸易大潮的涌动,新的以外资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的出现,典当业某些传统职能被淘汰;海运发展,粮、木、茶的运销又已转入新的载运和交易模式,而道光以后的徽商却未能适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形势,顺利地成功作出转型,遂无可避免地走到传统商业的极限而止步。

与此相反,移入珠江三角洲的中原士民,自一开始就不排斥“蛮夷”,不拒绝与原居民联姻通谱,很快就聚拢成为新的有实力的宗族,主客籍人并肩进行开发。由于地理上的有利,珠三角人民一直以海为田,“逐番舶之利”,大力从事海上贸易,并因而带动本区域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农业生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自明中叶以来,每逢国内外环境发生巨大变动,市场需求不时发生变化,珠三角人民都能坚韧地面对困难,灵活适应,敏锐地抓住商机,进行生产模式的改造、行业的调整创新,以及适应需要的人才培育,历近代以至于现代,演变成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汇地,

走向海外的通道,成为当前改革开放的先进地区。

由于南迁的时代不同,地理环境有异,推崇的理念和采取的措施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些主客观的原因促使徽州和珠三角有着不同的发展历程。本书有根有据地道来,条分缕析,是令人信服的。作者不但热情歌颂历史上徽珠两地区不惜漂泊湖海,曾经世代惨淡运筹经营,推进了社会进步的商人,还充分肯定一些卓有远见,大力扶持商业发展的达官大吏,例如清代康熙年间出任广东巡抚的李士桢,公正地认为,不应该泯灭其功绩。此外,作者还致力于贯通古今,瞩目珠江三角洲当前及今后广阔的发展前景,提出一系列具体建议,希望吸取历史上有经验的经验和教训,将珠三角的繁荣发达推向更高的一步。当然,他也没有忘情于徽州这片朝夕萦系于脑际的热土,殷切地盼望徽州聪明智慧、勤劳勇敢的人民,能够继承和发扬当年徽商敬业重商的优良传统,亦尽快尽好地投入当前改革开放的商品经济大潮中,与珠三角人民共作弄潮儿。

披读了全部书稿,笔者深受教益,因而蘸笔挥毫,十分高兴地写出这篇序言。

2003年暮春于广州师啻书室

我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代自序)

崇实求真是史学家的终极追求目标。空泛的议论和情绪化的论述是与史学无缘的。我的个性是感情往往胜于理智。对于一个容易情绪化的人,要理智而平实地叙述、议论史事,是有一定难度的。而我偏偏选中历史学,并以此为终生职志,实在是一种自我挑战。30多年来,我对于所选择的职业不仅无悔,且对它的热爱与日俱增。

记得1957年秋,我满怀兴奋地跨入了武汉大学历史系的门槛,但一经接触专业课之后,觉得史学枯燥乏味,曾请求转系而未果。幸得诸多老师的教诲和疏导,才逐步培养了对历史专业的兴趣。当时系里的老师中,有治隋唐史的唐长孺、治近代史的姚薇元、治经济史的李剑农和彭雨新、治墨经的谭戒甫,治世界史的则有吴于廑、曹绍濂等,各治一史,各有所长,可谓是群贤集聚。这些老师除李剑农先生因年老体弱、曹绍濂先生因错划为右派,不能给我们上课外,都先后给我们上基础课或专题课。老师们授业专注,认真负责。年近80的谭戒甫老先生,当年在课堂上给我们讲解老子“守柔说”的情景,虽事隔近40年还历历在目。可惜当时我学识太浅,不能领悟老师们学术的要旨精义,徒有景仰、羡慕之情罢了。但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启迪了我的思维,培养了我的学术兴趣,尤其是彭雨新、唐长孺和吴于廑等,即使离校后,依然得到他们一如既往的爱护和具体指导。武大历史系的老师为我铺平了走向学术的道路。每当念及武大,如沐春风,总是洋溢着欢乐和感激